

多味人生

—— 我这大半辈子的回忆

曹燕珍 著



多味人生

——我这大半辈子的回忆

曹燕珍 著



目录

- 一. 苦乐掺半的童年时代 / 1
- 二. 艰辛的少年时代 / 9
- 三. 奋斗的青年时代 / 14
- 四. 苦难、勤恳、自强的中年时代 / 24
- 五. 自得其乐的幸福晚年 / 39
- 后 记 / 48

多 味 人 生

—— 我这大半辈子的回忆

我这大半辈子经历着一个又一个酸、甜、苦、辣的人生旅程，
与我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同龄人相比，我的苦可能会更多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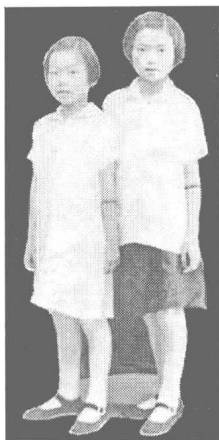
一 苦乐掺半的童年时代

1928年9月19日（农历戊辰年八月初六），“哇——”，一阵新生婴儿的响亮哭声，惊动了刚下班回家的父亲，他迫不及待地进了卧室，母亲对他说：“又生了一个丫头，而且是个没有下巴的胖丫头。”这个胖丫头就是我。看来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受欢迎的，因为那还是重男轻女的年代啊！我出生前，家里只有一个男孩，接着前后又出生了三个女孩，母亲感到很遗憾，表现出来的不悦，是很自然的，父亲却说：“只要母女平安，男孩女孩都一样。”当时这也许是父亲安慰母亲的一句话。

我在父母的精心抚育下成长起来。我7岁了，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母亲给我缝了一个书包，还有一个装笔的布套。父亲笑着对我说：

“我的美清是小学生了，要勤奋学习啊！”我非常高兴，特别把“勤奋学习”四个字牢记在心。

我和父亲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6年，这些年里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、关心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一致，使我倍受感动。父亲的思想比较开明，这与他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。他年轻时在武昌文华书院（位于武昌昙华林，原华中大



我和姐姐燕芳在武汉市第二小学念书

学的前身)学习和毕业,后来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在阜昌洋行从事英、俄语翻译工作。

我们的家庭人口简单,抗战前,父亲的



我的父亲



我的母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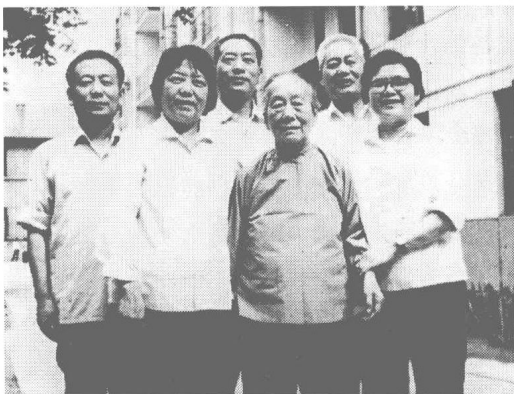
工资较高,母亲又会理财,在当时,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康之家吧!在这个和睦的家庭里,我们兄弟姐妹五人,从未受过父母的打骂和训斥。父母以身作则,身教重于言教,即使我们有什么错误,他们总是谆谆教导,使我们自感惭愧,懂得如何做人。记得我大约8岁那年,一位乡下亲戚(母亲的表姐)来我家玩,临走前,母亲将我们的衣物送了两大包给她,我满脸不高兴。姨妈走后,母亲对我说:“姨妈是你的长辈,从乡下来一趟不容易,我们就要拣好的东西送给她,否则心里有愧。你还小,但是要懂得什么是知情达理,怎样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。”这件事一直铭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。

9岁以前,我的童年是在比较欢乐和幸福中度过的。虽然时间短暂,但是我的性格和爱好似乎从那时就已经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,渐渐形成了。

上小学的第一天,我没等到天亮就起来了,在家里工作多年的李婆说:“这么早,学校的大门还没开哩,再睡一下,到时我会叫你的。”我看见李婆做清洁,我也帮着做,觉得很有趣,而且很开心。自此以后,我习惯早起,将自己的卧室收拾得干干净净,再去上学。我常常听见李婆在母亲面前夸我,心里真是乐滋滋的,没想到,从此养成了我爱整洁的习惯。

对我来说,上小学似乎到了一个新天地,除了语文、算术课外,

还有图画、音乐课等。我记得上音乐课时，老师教我们唱《锄草歌》，大意是：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，锄了野草好长苗呀！哟呀嘿，呀呼嘿，锄了野草好长苗呀，呀呼嘿，哟呀呼嘿！老师听我们唱歌



母亲和子女们

时的发音，我发现她喜欢在我的座位附近走来走去，原来她是在挑选唱歌的好苗儿，最后她选了12位同学参加唱歌、跳舞活动。到了春天，许多小学参加了在汉口中山公园组织的小学生表演，每次老师都要我参加，我非常乐意，而且十分认真。回到家里我也喜欢唱，那时我们家有一台留声机，是父亲买回来专门听京剧唱片的，他是一个京剧爱好者。在经常听唱片中，我学会了《借东风》、《贺后骂殿》、《四郎探母》等等许多唱腔。有一次父亲偶然问我：“你的嗓子很好，喜欢唱歌，能不能在家里学学京剧唱腔呢？”我立即回答：“我会唱。”父亲很惊讶地笑着反问我：“你会唱？”我说：“您听我唱一段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，好吗？”他听我唱后，喜出望外地说：“你还真有点悟性，以后爸爸听你唱。”那天父亲发自内心的爽朗笑声和心花怒放的样子，至今我记忆犹新，似乎就在昨天。

旧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，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没有几年，1937年7月7日又制造了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军队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，从此我们的国家更加是灾难深重、水深火热。我们的家庭也失去了欢声笑语，我的童年也由快乐而走向痛苦。

随着日军魔爪向我国内地的深入，一些家庭为了躲避战乱，准

备向西南迁徙。1938年的春天，我常听见父母商量着将全家迁往四川成都的种种设想。母亲是个细心人，要考虑事情的方方面面及其后果，她认为举家迁往成都，躲避日本鬼子的轰炸虽然是大前提，但是在那个举目无亲之地要住多久呢？还有，那个动员我们全家去成都的朋友（当时是西川邮政管理局的局长，是父亲的老同学）可靠吗？一系列的问题，使她困惑不安。父亲是个极其敦厚、谦和的老实人，他的为人之道是“宁可人负我，绝不我负人”，对他的老同学更是深信不疑。母亲虽考虑很多，但最终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决定。这样，我们全家于1938年4月从汉口动身，先至万县（因时局紧张，没有轮船直达重庆），在那儿住了2个多月，等待至重庆的轮船，再由重庆乘车至成都。当时由长江下游逃往四川的老百姓沿途皆是，每天最使父母发愁的是投宿小客栈。沿途小客栈多半是些破旧、矮小的草房或木板房，我记得房子上都插着“鸡鸣早看天，未晚先投宿”的飘带，以招揽顾客。我们兄弟姐妹对生活突然的巨大改变很不适应，特别是体弱多病的姐姐，受不了沿途长时间的颠簸而生病了，幸好母亲自备了一些必需的药，几天后姐姐转危为安，从母亲满面愁容的脸上，我开始见到了她的笑容。父亲如释重负地继续带着我们跋涉，经过近半月的时间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成都。

刚到成都，我们全家暂住在父亲老同学的公馆里。可是当我们一家老少的疲劳尚未恢复时，全家又得迁往距成都30多里路的东门农村。年幼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？看见父母的愁容，我们不敢多问，因为这是大人的事，小孩的提问只能增加他们的苦恼。

到农村后，父母最急于要解决的是我们的上学问题。那年，哥哥远赴长寿县，进入当时的国立第12中学读高中（免费），姐姐在成都考入华美女中（是一所教会学校，当时是成都最好的女中），我则带着两个弟弟去离家约有12华里的民办小学读书。

我记得上小学的前一天是父亲带着我们姊弟3人去的，我们见到的只是一间十分简陋的破房子，里面有4排残缺不全的桌椅。父亲请老师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，老师说，从一年级至四年级各分配一排座

位，从8点钟开始，先上一年级的课，时间是一小时，然后2、3、4年级接着各上一小时课。这样，在4小时内，每个年级的学生只上一小时课，其他3个小时则规定在原座位复习功课。父亲听了老师的介绍后，对我们讲了一些在困难条件下办学真不容易的鼓励话，要我们好好学习，尊敬老师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弟弟们在前面跑跑跳跳，我发现父亲默默无语，似乎若有所失。说实话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认为这样的小学是学不到知识的。父亲见我闷闷不乐，轻声问我：美美，看样子你对这个学校不满意，是吗？我说，这是什么小学呀！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，一定学不好。父亲见我这么不高兴，只好安慰我说：“我们刚来这里，情况不了解，只有这个学校距家近一些，先念着，以后再想办法，好吗？”我能说什么呢？在人生地不熟的农村，父亲忙进忙出为我们找个小学不知跑了多少趟路，看见他劳累的样子，我内心的体谅之情油然而生，于是我说：“爸爸，我听你的。”顿时，我看见了父亲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我懂得父亲的笑容，因为他知道女儿年纪虽小，却能理解他忧郁的心。

从武汉城市迁到成都乡下定居，经历了近半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，母亲的身体大不如前，经常生病。父亲从未干过家务活，哥哥和姐姐又住在学校，所以我成了家庭的“顶梁柱”。每天我比谁都起得早，六时半以前做好早餐（清水煮剩饭，吃泡菜），要在8点钟以前赶到学校。12里多路的乡村田埂、小道，真难走啊！特别是雨天或雨天刚过，泥泞的坡道，又陡又滑，我必须先上坡，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将弟弟拉上去。记得有几天连续下雨，弟弟们怕摔跤，不愿走这条道，哭着求我：“二姐，你带我们走一条平路好吗？我们怕摔跤，不是想逃学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走平路要绕过一大片水田，我们肯定会迟到。”他俩知道我的脾气，无容多言，我在他们面前算是一个有相当大权威的人。那天回家，弟弟们都摔了跤，像两个小“泥狗”，见到母亲后，他们觉得受了委屈，扑在母亲怀里嚎啕大哭。说实话，我很可怜他俩，但我认为这样要求他们是正确的，总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吧！

不久，这所民办小学的教学效果，使我产生了怀疑，我认为每天我们这么劳累地来回跑，究竟学到了什么？按我的年龄，只有一年的时间就要念初中了，我这样读下去，能考上初中吗？我可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！我将自己的想法对父亲说了：“爸爸，还有一年我就要考初中了，我不想再去民办小学念书，因为我认为学不到东西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买高小的语文和算术书，我可以自学，你做我的老师好吗？我争取以同等学力考取初中”。虽然我的想法出乎他的意料，但是他却明确地说：“你的想法很好，待我想想，订个计划。”

父亲终于按照我的意见买了高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书，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学习是很艰苦的事，只要自己有学习目标，坚信自己的毅力，你很勤奋，一定能够学好。”父亲的谆谆教诲和鼓励使我更自信。接着，父亲帮我安排自学语文和算术的计划，并对我进行了英语学习的启蒙指导。两个弟弟也随之不去民办学校而在家学习了。

农村的广阔天地，使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孩子感到一切都很新鲜。下午，我经常带弟弟去田园、丘陵玩。有一次，我们钻到一片甘蔗林里捉迷藏，连续碰断了几根甘蔗，当时我们跑得又累又渴，干脆把断了的甘蔗吃完了回家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一片甘蔗林的主人就是我们的房东，别人都称他为冯三老爷，在我的眼光里，他是个大财主，因为他的屋后除甘蔗林外，还有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橘子林，屋前的坡下是一片稻田，东边的坡地是一片棉花地，西边的坡地种的是杭菊花（可制菊花茶），这些庄稼都靠他们常年雇佣的农工来种植。冯三老爷真可谓是当地有名的土财主。



母亲与姐姐、大弟弟在上海

1940年的春天，哥哥突然回来了，他面容清癯而带着忧愁，似乎病得不轻。母亲安排他休息，然后告诉我，哥哥患了肺病，要我去煮面条。我很伤心，一面流泪，一面切葱，真是祸不单行，我不小心将左手的无名指尖切下了一块薄片，血流不止，母亲心痛地帮我包扎伤口。抗战时期，医疗条件很差，对一般老百姓来说，肺病算是重病了，谁用得起贵药，只能靠营养、休息来调理。更何况当时中国还没有盘尼西林（青霉素）这种特效药呢！哥哥的病，真让父母揪心。

有人说，每个人在童年时，都是时间的富翁。我却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的童年生活告诉我，童年是苦涩的，也是忙忙碌碌的啊！当时我只有11岁，却要默默地承受着心理和体力上的压力，首先我要自修语文和算术，准备以同等学力去考取初中；其次要协助母亲做家务，我主动承担了采购任务，经常要到距家8里路的小镇购买一切日常用品和蔬菜等等，还有每天的担水任务，也落在我的肩上，因为水井在距家约500米的竹林里。母亲是裹了脚的小脚女人，体弱多病，我一定不让她干这种活，所以我动员大弟弟一起抬水，母亲只在井旁守护着我们。

那时我们一家7口人，没有经济来源，全靠从武汉带来的首饰和衣物在寄卖行出售而来的钱为生。当时生活很艰辛，今后漫长的日子如何度过，母亲为此很着急。父亲安慰她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总可以想办法度过难关的。哥哥问母亲，为什么爸爸的老同学动员我们来成都，却一点也不关心我们？母亲说：“别提那个老同学了，我看他是个骗子，在我们来成都之前，他多次写信告诉你爸爸已在当地替他安排了工作，可是我们全家来后，他却要你爸爸帮他做生意，利用职权，发国难财。人各有志，我们宁可饿死，也决不为他卖命！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方知我们举家迁徙成都，是忠厚老实的父亲受了骗，有苦难言。母亲十分通情达理，在那种困难条件下，总是安慰父亲，而自己则竭尽所能，勤俭持家。

距我家约10里路有个小镇，叫红门铺，是附近乡村信件的收发地，父亲每隔3天去看看来往的信件。有一天，他从镇上得知，距家

约50多里路有个空军子弟学校，可以招收沦陷区的儿童入学，对我们家来说，真是出现了一线曙光。父亲将两个弟弟送往那个学校，那天他回来时，终于见到了他脸上久违了的微笑，父亲说：“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这下解决了他们的辍学问题，我的精神压力就轻多了。”紧接着，父亲和母亲商量，想回武汉一趟，设法筹点钱，作为维持今后的生活费。

1940年的初冬，父亲毅然孤身一人，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武汉，家里就只剩下母亲、哥哥和我3人度日，母亲更是终日忧心忡忡，特别挂念父亲的安危。为了缓和她的苦闷和多愁善感，我总是想方设法让她开心一点。有一次，我对她开玩笑说：“妈妈，你整天愁眉不展，像一个忧愁的公主一样……。”这句话逗得她真的笑了。她反问我：“你真的见到过忧愁的公主吗？我这么大年纪还像公主？”于是我们一起开心地大笑起来。

我没有辜负父亲对我的教导和希望，1941年，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华美女中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真是高兴得跳了起来，我梦寐以求的念书愿望将要实现了。有一天母亲陪我在井边洗衣，我一面低着头洗衣，一面得意忘形地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上中学后，就脱离这个苦海了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话，默默无语。我猛然抬头，看见母亲怅然若失的样子，我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刺痛了她的心，至今我都没有忘记她那忧郁的眼神。那几年，我和母亲朝夕相处，是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。我年纪虽小，却是她的好帮手和贴心的女儿，一旦要与我分开，她该有多难过，我不知如何去安慰她。晚上母亲睡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眠，我则捂着被子潸然泪下。我想我走后，母亲最大的困难，就是每天的饮水问题，急中生智，我突然想起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心里豁然开朗了。第二天，我对母亲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上学后，哥哥可以去买菜，吃水的问题，你与房东冯三伯商量一下，请他们的雇工每天帮我们挑一担水就足够用了，一个月就付给他们一次钱，你看好吗？”看来，房东对我们家的困难是同情的，经过母亲的交涉后，欣然同意。我如释重负，终于可以安心上学了。

二 艰辛的少年时代

姐姐比我大4岁，1941年，她在家里度完暑假后，就准备带我去上中学。由于学校距家很远，平时只能住校，寒暑假才可以回家。临行前，我们尽可能帮母亲多干些活，以减轻她的劳累，这样我们的内心也会感到宽慰一些。

抗战期间，华美女中迁往成都北门的郊区，校舍的北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，南面是一条流水小溪，四周则是一望无际的庄稼。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美丽如画的环境。

盼望已久的学习生活，对我来说十分新鲜。班上40个同学来自四面八方，从她们的穿着和打扮来看，她们大多属于有钱人，其中少数是自家的小轿车送来的，另一部分是家里的黄包车送来的，经济差一点的是雇黄包车来校。像我这样的学生，出了城门只能雇独轮“鸡公车”（当时农村最简便的手推车，只坐一人）。推鸡公车的大伯将一条宽带搭在肩上，两手左右各扶一车柄，推车前行，车子发出很有节奏的响声，好似音乐在伴奏。

学校纪律严明，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校长是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教师，她负责行政工作，还兼教一门高中的化学课，听说她的英语也很棒，业余时间爱好打网球。我们的英语教师是个美国传教士，学生都称她巴老师，个子不高，有点胖，戴一副眼镜，她对学生的严格和责任感人人皆知，很多学生害怕上她的课。上课之前，我也提心吊胆，唯恐达不到她的要求。姐姐鼓励我：“只要你上课时思想高度集中，她提出的要求你能做到，下课后按她的发音记单词，并逐步做到背诵课文，你一定学得好。”我在班上的学习，一直受到巴老师的表扬，成绩总是领先。可是，数学却使我为难，我只好求助于姐姐。姐姐很聪明，数理化学得特别扎实，深受老师的器重和关爱，甚至当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初中时，老师们都为她高兴而开玩笑说，有其姐，必有其妹。我知道这句话的份量，我暗自下决心，勤奋努力，决

不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。我深信自己能够“笨鸟先飞”。

初中三年，对我来说，最困难的是经济上的压力。每学期开学，同学们可以按学校规定如数交学费，可是我和姐姐的学费则要靠寄卖行售出我家物品的多少才能决定，因此，我俩几乎每学期都要申请缓交学费。当时的社会，贫穷与富有，会影响某些人的看法，即使我小小的年纪也能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我对这些现象处之泰然，只知埋头学习，我要靠良好的学习成绩来赢得人们的尊重。当时我们班上有四川军阀杨森和刘文辉的女儿，还有大商人的女儿，我与她们极少交往，只是与同桌的晓清相处很好，她爸爸是教师。二年级以后，杨森的女儿杨霞经常主动地接近我，我发现她学习认真，衣着朴素，没有小姐的娇气，我们慢慢地相处得很融洽了。放暑假前，她几次约我和晓清去她家玩，开始我们都说没有得到妈妈的同意是不能随便去别人家里的，最后她只要求我们上午去玩，我得到了姐姐的同意后，与晓清去她家玩了一个上午。她的家真是不一般，光住在成都大院里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就有近30人（均为杨森之妾所生），他（她）们的命运受其母亲被爱宠的程度而有异。院内有篮球架、排球场、餐厅等，起床、用膳均有工人敲钟。这样的家庭，如果光听别人说，我不会相信，今天亲眼目睹，感到很奇特。杨霞在众多姊妹中显得孤僻一些，也许与她母亲悲惨去世有关。我不愿触动她的伤心事，对她十分同情，并且关心她。

学习之余，我喜欢唱歌，但低年级的



母亲和我们姐妹在武汉“八办”

初中生是没有资格参加学校歌咏队的。姐姐也有一副好嗓子，她参加了学校歌咏队，每次她们练唱，我都去旁听，我很快就学会了。回到班上，我就把学到的歌教给爱好歌咏的同学。当她们知道我会唱京戏后，还要我教她们唱京戏，我一板一眼地教，她们认真地学。学校还有钢琴室，每学期有12位同学可参加业余钢琴课。姐姐参加了4个学期的钢琴学习，我很羡慕她，当我偶尔走过钢琴室门前，总喜欢悄悄地从门缝中窥视。我做梦也想学钢琴，但这只能是埋藏在心底的一种奢望。

1943年，哥哥的病初愈后，参加了工作。这时父亲也即将自武汉返回成都。从家里的经济能力看，要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及我们姐弟4人的上学费用，仍是很难的。姐姐即将高中毕业，而我随时可能面临着又一次辍学。晓清知道我的情况后，爱莫能助，只希望在初中最后一个寒假里，请我去她家玩一次。我得到母亲的允许后去了她们家。我意外地发现，我们家寄卖的皮褥子竟垫在她们家的躺椅上。除了惊异，我只能暗自感叹。

姐姐在华美女中，从初中到高中六年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。可是贫穷会使她暂时失去继续上大学的机会。当时初中部正缺数理化的教师，在高中任教数学课的胡鹏老师极力推荐姐姐教初中的几何课。校长认真考虑后，终于破格让高中毕业的姐姐去初中任教，可是附加了一个条件，试用期一年，合格后方能转为正式教师。母亲知道后欣慰地说：“这真是绝处逢生啊！只要经济条件稍有好转，我的女儿是一定要上大学的。”

我的同班好友知道我不可能继续上高中时，感到十分惋惜，大家七嘴八舌给我出主意，我倒很乐意采取打工攒钱念书的办法。正好有位同学的亲戚开了一个私人诊所，想请一个护理工，问我去吗？我想一定得征求母亲的意见，不能自作主张。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，她对我说：“你年纪还小，又是个女孩，我不放心你去做，姐姐是经老师推荐在本校教书，学校环境单纯，又有老师的关心，而你是一个人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医院，我不能让你去。”我说：

“妈妈，你让我去看看，了解情况后回来告诉你，再由你决定，好吗？”

经母亲同意后，我从家里步行至市内，按地址找到了那个诊所。我硬着头皮，大胆地进去找到了老板，他摆出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接待我。可能从他亲戚那里知道一点我的情况，于是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到我的诊所来做护理工，首先要定几条规矩，一，勤勤恳恳，不怕脏累；二，协助护士护理病人，服从工作安排；三，不准谈恋爱；四，经一年试用后签定5年合同。”特别是第三条，他说，过去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护士、一个护理工都是因为谈恋爱，工作不安心，被我辞退了。你来了以后，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。他的话使我火冒三丈。我拼命忍着，直到他讲完，我镇静地说：“待我回家与妈妈商量后再作决定。”

走出了诊所门，我憋着一肚子怨气，急急忙忙地往家赶。快到家时，夕阳西下，天色朦胧，我老远就见到了母亲在冯家大院门前的一棵大树下等我。我边跑边叫：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妈妈见到我心痛地对我说：“你在外面跑了一天，我在家里着急了一天。快回家，又累又饿了吧？”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下扑到她的怀里，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母亲知道我的个性，再苦再累我不怕，就怕受委屈。回到家里，我将情况讲给她听后，她马上说：“这种地方，决不能去。我们在家喝稀饭，熬一年，你再去考一个免费的国立高中念书。”妈妈是个半文盲，她出生在农村，是个遗腹子。我的外婆千辛万苦将她抚养到大约五岁时，在汉口开酱园铺的舅舅将外婆和妈妈接到汉口长住。舅舅比较开明，家里请了一个教书先生，教子女读书，我的妈妈也有了学习的机会。妈妈深知没有知识的痛苦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让子女有比较高的文化。她对我说，“老前辈常说：只要功夫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，你能以同等学力考取初中，从现在起，你在家自修一年，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考上一个理想的高中。”母亲的话对我是动力，也是极大的鞭策，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心和毅力。我知道难度很大，在当时要考进一个竞争激烈的高水平的免费高中，将有多

少竞争对手，真是望尘莫及呀！我对自己提出了“只能艰苦努力，方能如愿以偿”的要求。

记得是1945年的初夏，母亲有好几天心事重重，我问她，“妈妈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？”她说，“这几天，我在想念你的姐姐，一个半月了，她没来信，是不是生病了呢？我想你去看看她吧，又要耽误你复习功课的时间。从东门走到北门乡下，够远的，一天赶不回来。”我说：“妈妈您别担心，我明早去，后天就赶回来了，只耽误一天学习，没关系。”母亲又嘱咐我，“你姐姐如果生病了，这个月不要她给我们生活费，让她留给自己好好补养身体。”

第二天，刚天亮，我就起床，吃了水煮剩饭就出发。母亲再三叮嘱我，中午在城里一定要买东西吃，否则会饿昏的。由于想尽快见到姐姐的急切心情，我走得特别快，走到学校时听见了下午上课的铃声。我很快找到了姐姐，她见到我惊喜交加，安排我在她的宿舍休息，就马上去上课了。姐姐回来后，告诉我说：“12天前，教学楼晚上突然发生火灾，全校师生都去救火，我还到钢琴室去帮着搬钢琴，那时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，几个人终于把钢琴搬出来了，可能是受了惊吓和劳累，病了好几天，现在全好了。妈妈身体好吗？你走这么远来，够累的。”我知道姐姐的情况后就放心了，第二天我要尽快赶回家，以免母亲惦念。为了省钱，我仍坚持步行回家。姐姐送我走，并给我生活费，我强调母亲的意见，要姐姐留着钱保养身体，姐姐着急了说：“生活费重于营养费，你看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？你回去告诉妈妈不要担心我，不要整天发愁，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，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我想这是姐姐的一句安慰语，可是在我回家的漫长路上，她的话却一直萦怀在我的心里。

少年时代的艰辛生活，锻炼了我勤于思考，不随波逐流，吃苦耐劳，坚忍不拔的性格。这种性格一直保持到现在，似乎丝毫未变。这种性格使我克服了大半辈子在思想和生活中的无数艰难困苦，攻克了事业上所遇到的重重难题。

三 奋斗的青年时代

经历了艰辛少年的短暂历程后，稍稍有点空余时间，我就喜欢回忆那失去的金色的时光。如果从物质生活上看，那些日子是苦涩的，但是从一个儿童的成长来看，我却认为那是金子般的光阴，十分宝贵，因为逆境和贫困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。从小生活艰难的人，最懂得奋进的涵义，最能理解为何要知难而进，从而自觉地要求少壮须努力，并且更能体会父母关爱中那种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的浓浓情意。我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就是这个道理吧。

为了来年考高中，我根据自己的情况，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。每天除了帮助母亲做点家务外，一心扑在学习上，经常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，忽然听见父亲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叫我，我高兴地向外奔跑去迎接他。只见他肩上前后挎着包，手上还拎一个包。我马上卸下他肩上的包，母亲也出来了，把父亲迎进了门。分别两年多再相见，我发现父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。他为了全家呕心沥血，经历旅途的奔波，对一个近60岁的老人来说，真是力不从心，勉强而为之啊。见到他安全归来，我的心情是悲喜交加。我想，待我自立后，一定好好孝敬父母，让他们有个幸福的晚年。

有一年报考学校的时间来临，经过姐姐多方面了解，她决定报考四川大学，并要我报考川大附中。1945年，姐姐考取了川大物理系。我庆幸自己在辍学一年后，终于以约1/200的比例，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录取了免费的川大附中。我兴奋得夜不能寐。

当我又重新获得上学的机会后，如饥似渴，将学习计划安排得十分紧凑。因为父亲的教诲时刻铭记在我脑子里，他曾对我们讲：“我们家的孩子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获得知识。要有真正过硬的一技之长的本领，才能立足于社会。”我认为自己的学习目的明确，非常自信。